

创新是关键：亚洲和中国的未来十年

记者：谢欣辰



MAGGIE XIAOYANG CHEN

乔治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跨国公司、国际贸易和区域贸易协议。

「提高生产率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其一是通过创新提高私人公司的生产效率，如此所有公司的生产效率都将会提高。其二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如此生产率高的公司会享有更多资源，而低效率公司则会被淘汰。」

记者：您出席了上海论坛主题为“亚洲经济如何重返繁荣”的子论坛。那么您采用哪些标准来评价和预测亚洲经济的发展呢？基于这些标准，您对亚洲经济的前景预期如何？

Maggie Chen：一般情况下，我采用的标准与其他人基本无异，比如，GDP 增长率、进出口增长率、通货膨胀、外债/GDP、外商直接投资（FDI）和资本流入/外流。根据上述标准，我认为未来十年，亚洲仍然是经济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亚洲仍然是一个稳定发展的地区，尽管发展速度不如近十年快。而一般而言，驱动增长的主要因素仍然是贸易、FDI 和投资，但同时希望国内需求、服务、创新和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有所提高。所以从整体来看，我仍然看好亚洲经济。当然，问题也存在，比如中国的增长减速对区域乃至对全球均有影响。

记者：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流，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那么在您看来，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是否有利于亚洲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稳定，为什么？

Maggie Chen: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确是一个势不可挡的趋势。全球各地都是这样，并且这一趋势还将继续。我认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整体上有利于亚洲经济的发展和稳定。这不仅为亚洲的公司带来了更多进出口机遇，还带来了亚洲内外跨国公司提供的更多 FDI。此外，亚洲的经济一体化还将为亚洲国家间带来更多其他领域的合作机会。特别是当美国正在推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时，亚洲，尤其是中国，必须建立对应伙伴关系和一体化集团，这一点很重要。

然而，这明显存在问题。首先，比如 TPP 目前并不包括中国，而亚洲的区域贸易协定也极有可能不会囊括美国。但有些国家必会同时签下两种贸易协议，这意味着中国和美国可能在上述协议网络中扮演着类似于“发言国”的角色。如果我是一家公司，我可能会愿意在越南、马来西亚等枢纽国开展业务，而非发言国，因为枢纽国与中国和美国都签订了协议。这样，枢纽国在某些方面，如吸引 FDI，会更有竞争力。这就是我们必须探讨的一个问题。其次，尽管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够通过多元市场来确保稳定发展，但也能引发经济危机。如果某个成员国发生了负面冲击，就会蔓延到其他成员国，因为成员国之间存在深层贸易和金融关联性。

记者: 那么您认为亚洲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发展到何种程度？亚洲能否建立像欧盟一样的一体化集团？

Maggie Chen: 我认为，亚洲无法达到像欧盟那样的一体化程度，至少在短期内无法实现。欧盟是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经济集团。欧盟已经远不止是一个贸易甚至经济一体化集团。亚洲则不然。在亚洲，各国总体上处于欠发达，同时各国处在差异较大的不同发展阶段。考虑到这一点，再加文化和历史原因，各国的经济目标也各不相同。因此，我认为我们无法达到欧盟那样的一体化程度。但是，要着手提高一体化程度，贸易自由化肯定是当下最重要的一步。但即使这样，也需要付出大量工作和努力，因为当事情牵涉如此之多的发展中国家时，由于每个国家都想保护农业、服务业等本国国内行业，谈判就会十分艰难。

但总体而言，我认为，即便我们无法达到欧盟那样的一体化程度，这也绝对是一着漂亮的棋。可能这就够了，因为如果达到了像欧盟那样的一体化程度，就可能会面临许多已经出现的严峻问题，比如我之前提到的危机蔓延。

记者：您认为亚洲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会遇到哪些困难？

Maggie Chen：我认为，问题之一，正如我之前说的那样，就是所涉及的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并且这些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当你努力使所有这些国家一体化时，必须平衡这些迥然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利益，这是十分困难的。很难同时协调这么多不同国家间的利益并提出所有国家都一致同意的政策。例如，农业往往是一体化推行过程中比较艰难的一个领域，另外一个则是服务业。各国不愿意在这些行业过多地依赖外国供应商。因此，这些可能会成为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些挑战。

此外，我们签订了如此之多的协议，一份接一份。比如在亚洲，东盟（ASEAN）已与中国、印度等国签订了协议，而除了 ASEAN，中国还与新加坡、韩国签订了协议。这些协议已经成为我们平常所说的“意大利面碗”（spaghetti bowl）。所有这些协议都设定了不同的规则，如原产地规则 and 不同深度规则。公司乃至国家很难理解并实施这些制度。如果我是一家有意进行投资的中国公司，我会在投资地点、金额和内容方面难以抉择，因为哪个国家的市场准入政策最优、成本最低不好说。众所周知，全球化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生产分散化。许多公司将生产进行分割、不同的生产阶段安排在不同国家，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当你签订了诸多相互干扰的协议，公司就很难制定出最佳的生产和区位策略。这些就是我们将会面临的一些挑战。

记者：如今，我们用“新常态”来定义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的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中国主席习近平也提出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概念。那么您对中国的新常态，比如中国的 GDP 增长减速，有何看法？造成这一情况的国内外原因有哪些？

Maggie Chen: 中国的发展速度显著减缓。我认为，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很明显。过去十年中，中国的发展由投资、贸易以及建筑业、制造业等行业拉动。对这些增长引擎的依赖会导致许多风险，而经济也易受其影响。例如，当美国、西欧国家等工业国家进入经济衰退时期，海外需求疲软就显著降低了中国的出口和经济总增长。而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无法持续很长时间，因此也就无法成为可持续的增长源泉。此外，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实现了史上最伟大的一项结构转变，有上百万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经济体。但如今，中国正处于这样的境地，即没有更多可从农业转移至制造业的劳动力且劳动力成本迅速攀升。因此，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也意味着中国必须找到其他的增长引擎。

众所周知，我国正努力从投资和出口导向型增长转变为内需驱动型增长。同时，我国也处于下一个结构转变时期，即从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转变为多元化经济体。我认为，提高 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一个更具创新力的经济体也很重要。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国的生产率增长速度不及 GDP 增速。提高生产率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其一是通过创新提高私人公司的生产效率，如此所有公司的生产效率都将会提高。其二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如此生产效率高的公司会享有更多资源，而低效率公司则被淘汰。这样，国家的综合生产率就会提高，这一点对中国的持续增长至关重要。

记者: 在上世纪 90 年代，日本经历了房地产市场泡沫引起的金融危机。同样是东亚国家，您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与上世纪 90 年代日本的经济形势是否存在任何相似点？为避免中国经济陷入所谓的“硬着陆”窘况，您认为中国应采取哪些措施来防止本国重蹈日本的覆辙？

Maggie Chen: 是的，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房地长市场和资产市场泡沫以及两国均属于出口拉动增长型经济体的事实。但也存在差异。第一，中国的发展阶段与日本当时所处的

发展阶段截然不同。当时的日本已经是一个人均 GDP 很高的发达国家，而中国目前的人均 GDP 仍然相对较低。这是上世纪 90 年代的日本和如今的中国之间的一大差别。这也意味着，中国可以避免陷入日本的窘境。在经济转型和增长方面，中国仍有很大的空间。举例来说，中国的服务业仍有更多自由化和增长空间。因此，中国比上世纪 90 年代的日本更具增长潜力。在经济政策方面，我国需避免在货币和财政政策上犯日本所犯的错误，同时也需推行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记者：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最重要方面之一就是产业结构调整，这也是早前其他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与那些国家的经验相比，您认为中国此次结构调整的特定特征是什么？其他发达国家有哪些经验可供中国参考？

Maggie Chen：在行业结构调整方面取得成功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包括韩国、日本、新加坡等。我们可以从这些国家中借鉴很多经验。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国的第一次转型使其从农业经济体转变为制造经济体。这一过程促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现在，我国正开始进行第二次转型，目标是转变为一个多元化经济体。我们不应该放弃制造业，但应该寻求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兼顾制造业和服务业。所以，这就是我国此时面临的情况。

我认为，我们可以着眼于韩国，借鉴其经验。例如，我们可以借鉴其研发政策。韩国通过提供信贷和补贴，鼓励公司创新。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但仍可以改善效率和创新政策的回报，以便更好地配置物质和人力资本。我们应该成立自己的高科技优质公司，同时逐步提升价值链，从以低端制造为主的经济体发展为拥有高端、优质和高技术含量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经济体。创新和人力资本是关键。鉴于新公司的生存率很低，政府需要做的就是更好地识别有发展前景和潜力的公司，包括新创公司和现有公司，并实行创新、扩张、质量和生产率提高激励机制。政府还应再接再厉，促进产学合作。

记者：您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在全球新常态的环境下，您认为中国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应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Maggie Chen：中国的出口企业过去常常打价格战。如今，这些企业应该努力改善其产品和服务质量以及其在外国市场上的信誉。这方面可以借鉴日本和韩国的做法。在积累了更多出口方面的经验后，这些出口企业就可以学会从市场和产品入手扩大规模。多元化是增长和降低风险的一个有效途径。这些出口型公司中的部分公司也可发展为跨国公司。有证据表明，出口是 FDI 的垫脚石。例如，我可以从成立一家出口企业着手，在掌握有关国外市场的更多信息后，可以直接在该国投资，以降低贸易或生产成本、扩大市场准入。中国的出口企业可将这些办法作为下一步措施。